

专题

◀（上接 13 版）

年公布为虹口区历史遗址纪念地）二楼一间可容十二三人的小房间。1930 年 2 月 16 日，左联筹委会在公啡咖啡馆举行最后一次会议，成员全部到会，其中包括“没有特殊情况一般不到会”的鲁迅，他在当天日记中记述“午后同柔石雪峰出街饮咖啡”。十多人围聚一桌畅所欲言，最终达成共识。

“这是中共中央，甚至党的主要负责人第一次直接过问文艺工作，而且在中国现代文化建设史上起到了关键作用。”王锡荣说，左联得以成立，除了党中央的直接干预，还有两个因素不可忽视：一是这批文人在思想上的共通性。1920 年代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了大量文学社团，其核心是要摆脱几千年的思想痼疾，让文学突破才子佳人、鸳鸯蝴蝶的包围，“如果没有一种共同的突破意识，没有挣脱旧体制的强烈愿望，左联是无法组织起来的”。

王锡荣认为，左联能够成立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上海本身所具备的得天独厚的条件。首先，上海是近代中国经济文化中心和远东第一大都市。尤其是 1925 年经历了五卅运动之后，上海的工人阶级更能

接受以“无产阶级文学”为口号的左翼文学运动。第二，海派文化特有的突破精神、创新精神，让上海这片地域更易于产生和接受新文化。第三，上海是中外文化交汇之地，外来机构、设施特别集中，容易吸引外国人和留学生，同时通讯便利、信息快捷。第四，1920 年代中期以后，包括鲁迅、郭沫若等文坛巨子在内的大批文化人，涌入当时相对平安的上海，极易引发文学上的交流和碰撞。“在当时的中国，除了上海，不可能有第二个地方具备这样的条件。”王锡荣说，中国共产党因势利导，水到渠成地在上海组建起了左联“这绝非偶然，而是历史的必然”。

1930 年 11 月，左联派萧三作为代表参加在苏联哈尔科夫召开的第二次国际革命作家代表会议。由此，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加入国际革命作家联盟，成为它的一个支部——中国支部。

有“党团”的左联

在左联纪念馆二层展厅，挂着一张“左联组织系统略图”。“你看，中间这个标红的地方写着‘左联党团’，可

见左联是有党团的，说明左联是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这点也可以从左联当时的领导机构上再次找到印证。”左联纪念馆工作人员说。

记者看到，在这张图上，左联的领导机构是“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下简称文委）和“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下简称文总）。文委是 1929 年下半年中国共产党中央宣传部为了加强党对文化工作的领导而成立的，是左联党团的上级领导机关。左联行政上的上级领导机关是文总，而文总的党团成员其实就是文委成员，实际上，文委、文总是两块牌子、一套班子。左联成员林焕平在回忆录《从上海到东京》中写道，“左联是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活动的，因而它有个左联党团，并且以党代政，几乎就是以党组代替了执行委员会”。根据周国伟所著《左联组织系统史实考》一书整理，左联历任党团书记为冯乃超、阳翰笙、冯雪峰、钱杏邨、耶林（张眺）、丁玲和周扬。任白戈在《我在左联工作的是》一文中，对左联组织机构的描述如下：“左联下面的组织，完全和党的组织一样，分为沪东、沪西、闸北、法南（法租界和南市）四个区。”

左联纪念馆研究人员告诉



左翼刊物

记者，尽管左联是党和非党作家联合组织的群众性团体，但左联成员都要参加一些政治活动。比如，经常发表政治宣言，如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发表《告无产阶级作家革命作家及一切爱好文艺的青年》；比如，参加一些公开或半公开的革命政治团体活动，如参加“反帝大同盟”，如 1932 年“一·二八”事变后派代表参加慰问团到闸北前线慰劳战士，如参加 1932 年“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大会”的筹备工作等。另外，左联的日常活动包括小组活动常常以学

习党的文件、讨论国内外形势等政治内容为主，并不是纯文学的讨论。

根据张小红的著述，左联在当时还有一大作用，是吸纳“寻找者”。所谓“寻找者”，一种是原本为中共党员，大革命失败后与党组织失去联系，现在要寻找党组织恢复关系；另一种是进步青年或人士向往革命，在寻找党团，“这两种人都把参加左联作为参加党组织的一种途径”。

比如，王尧山在《忆在左联工作的前后》一文中，就写了 22 岁的自己通过左联找到党组织的故事：在“一·二八”事变后，他与党组织失联，后来参加了进步组织青年文学研究会，并在活动中引起了左联盟员周文的注意，“一次，在马路上边走边谈时，周文征求我参加左联……左联的性质是秘密的……通过周文又接上了党的关系，在左联的党组织中工作”。再如，于伶在《北平左联到剧联回忆》中，写了 1930 年夏天，23 岁酷爱左翼文学的他从上海考到国立北平大学法学院，如何通过读书会加入北方左联，并通过相关联系人加入党组织的情况。

张小红认为，在 1930 年代白色恐怖的环境下，虽然参加共产党是要冒极大风险的，但仍有很多人在寻找党、参加党，“他们为找到左联，参加左联而兴奋，因为这意味离参加党不远了”。

“从诞生到解散，左联自始至终都和党有着密切的关联。”左联纪念馆研究人员说，1936 年初，为适应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中国共产党要建立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左联自行解散。“虽然左联的历史不过短短 6 年，但是它以在当时的巨大作用以及对后世的深远影响，为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甚至建国以后的人民文艺事业培养了一批骨干。”

1920 年代初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文化机构寻踪



【人民出版社】

1921 年 7 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为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以适应革命发展的需要，中央局于 1921 年 9 月 1 日在当时中央局宣传主任李达寓所（老成都北路 7 弄 30 号，原南成都路辅德里 625 号，1922 年 7 月在此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创办了我党的第一个出版机构——人民出版社。1921 年 9 月出版的《新青年》杂志第 9 卷第 5 号上发布了人民出版社第一个通告，简述创社宗旨与任务。

【上海书店】

1923 年 11 月 1 日，上海书店在上海南市小北门花园路（今人民路）振业里 11 号开业。上海书店由党中央直接投资，由中共上海地方兼区执委委员徐白民为第一任经理，后由毛泽民接任。上海书店继承了党的第一个出版社——人民出版社的光荣传统，致力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播和反帝反封建运动的宣传，承担了 1924 年至 1925 年间中国共产党统一和扩大马克思主义的宣传的主要任务。1926 年 2 月 4 日，军阀孙传芳以“印刷过激书报，词句不正，煽动工团，妨碍治安”为名，查封了上海书店。

